

苗疆边缘“中心地”的移民：明清“麻阳”人口流动研究*

黄 权 生**

前言

一、从“继续外交”到“出兵应援”：册封失败后的战略更张

二、从“外交观望”到“一意进剿”：再战前后的实际应对

三、战争后期的进剿受挫与明朝的战略动摇

结语

内容提要

明清麻阳移民迁出模式是：跨越族群“边界”的移民，真正发生过的、现实活着的、移民历史基本可考的、持续时间长并以自发和渐进性移民为主的、内聚性的外迁移民方式。其特点是：麻阳移民外迁有移民轨迹麻阳寨、麻阳街聚落可寻；有移民身份麻阳兵可查；有移民交通工具麻阳“土产”麻阳船可用等特点。明清随着麻阳移民人口的外迁，麻阳移民作为“外地人”在迁入地，跨越族群并形成了“天下麻阳人是一家”的地域认同理念，并聚族而居。麻阳借助其“寨、街、兵、帮、船”的移民和商贸网络体系，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独一无二的苗疆“移民圣地”。

【关键词】

苗疆 麻阳 人口流动 移民圣地

* 本论文在2019庆北国立大学人文国际学术周国际会议（11.6.-8）上发表

** 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huangqsh518@163.com

一、引言

四川民间有“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今天湖北麻城成为今天巴蜀地区心目中的祖源地，即祖籍地。笔者在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文化中，多次发现四川和鄂西等地口传祖籍地为“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在麻城寻根未果，却在苗疆麻阳寻根成功的实例。为此笔者对麻阳及其移民后裔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在麻阳县一些家族家谱将麻阳县城为“麻城”。笔者考察发现明清以来，在四川、贵州、湘西、鄂东南各地分布着大量的麻阳聚落性移民，其中麻阳官村田氏就有近100支家族迁入四川¹⁾。如四川合川有麻阳沟、麻阳移民后裔地名大小阕家沟，秀山有麻阳寨、酉阳有上下麻阳寨等；鄂西南宣恩、来凤等地也有麻阳寨；湘西保靖县、花垣县也有麻阳寨，这些麻阳移民后裔除了和麻阳移民迁出地家谱可以对接外，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班辈都是一致的，具体情况见笔者麻阳移民聚落考察图和麻阳寨和麻阳街分布图。

赵世瑜指出“山西大槐树”是华北移民的文化祖籍符号地，难以寻根，而明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圣地的移民迁出地和移民迁入地一般也难以对接。但整个麻阳移民地名或移民聚落的形成，完全是明清麻阳移民迁徙并定居所形成的。外迁移民点基本可以和原籍麻阳谱牒、始祖甚至派行（辈分）进行对接。明清麻阳的移民影响目前不被学术界所关注，笔者通过数年的文献积累，统计了全部的武陵地名资料、四川全部地名录以及多次对麻阳、保靖、秀山、合川、酉阳、利川、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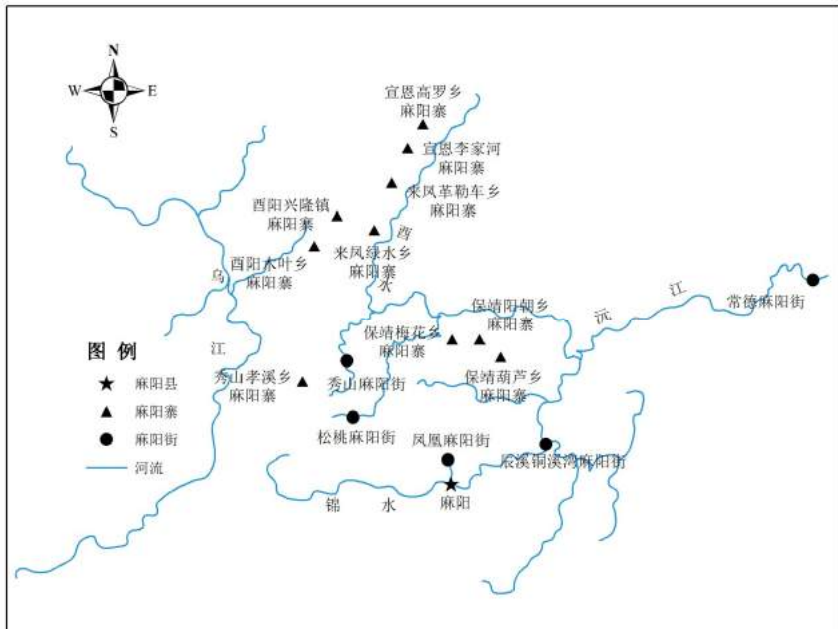
1) 金项目：该文得到黄权生主持的2018国家社科基金“宋元以来武陵山地人口外迁与文化交融史研究”（18BZS060）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项目：“明清以来武陵“神州”（辰州）“湖广填四川”研究”（18SKB005）的资助。

作者简介：黄权生（1977-），男，重庆巫山人；三峡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主要从事三峡和武陵历史地理研究（电话：13477125812）。

参见光绪麻阳官村《田氏族谱》老谱，共十二册，其中外迁宗族共248支，四川98支，贵州55支，湖南28支广西22支，湖北和云南各11支。

丰、宣恩、来凤、铜仁、沅陵、辰溪等地进行了实地田野考察，得出麻阳是苗疆最为重要的移民祖源地。

图表1、麻阳寨和麻阳街分布图



(该图由杨霄博士绘图，图中都是2013年到2016年1月间已经确认和考察过的麻阳寨和麻阳街。其中标准五角星表示移民“中心地”麻阳；三角形表示已经考察确认的麻阳移民村寨；黑点表示经考察确认的麻阳移民后裔形成的麻阳街。其中笔者在对辰溪考察中，在辰河和沅江交汇处，当地老人说主要是麻阳来的商人居住，故该地也是事实上的麻阳街，该图中汉口麻阳街和合川麻阳沟没有标注出来，特此说明。)

麻阳地处内地“边缘地”苗疆，其能迁出如此多的移民，这本身就与中国其他八大移民迁出地有所不同。学界所公认的“八大移民圣地”都处于在“内地”，或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这些“移民圣地”对外输出人口的主要是“汉族”

人口。但作为苗疆边缘地麻阳所输出的人口族群是多元的，主体移民是当地土著主动接受“王化”“苗变汉”后，然后作为边缘地的“编户齐民”外迁到苗疆、云贵、巴蜀、湘鄂等地，这种移民无论从迁出方式、迁出路线、迁出原因、迁出手段都与内地“汉族”移民是有明显差异，其移民的特殊性极其明显。

麻阳移民是在多元一体民族大背景下，在明清时期苗疆的边缘地“王化之民”与“化外之地”的“边界”上，族群之间长期交往和融合过程中，不断将原属于“苗地”的各族群“跨越边界”互动、交流、“孵化”、融合后再迁徙的移民。故这里的移民是“融合”后的迁徙，不是原来内地移民迁入“边地”后的“融合”。简而言之，融合造成了“移民”迁徙，而不是“迁徙”后造成的“融合”，这与其他各个移民圣地差异巨大。

用一句话，对麻阳移民的总体性质加以概括：它是来自边缘地苗疆“苗汉”“边界”移民地，是真正发生过、自发的、内聚的、活着的、可考的、现实的、边缘（边界）的，有移民轨迹（寨、街聚落）、移民身份（麻阳兵）、移民交通（麻阳船）、移民组织（麻阳帮、麻阳会馆），拥有移民圣地和过程的历史群体。

麻阳移民外迁是自发性、渐进性、长期性、多族性的移民外迁。“山西大槐树”或“湖广填四川”移民方向具有单一性。麻阳地方的移民迁出时间长、迁出方向多元、迁出过程具有复杂性，不是某种因素造成的“事件性”移民或“强制性”移民。明清以来，麻阳地方虽然受到国家和地方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但几百年来，其移民的行为实质是“向心的”，带有边缘族群“国家认同”性质的移民，其是自发式“内聚式”为主，又带有“准军事性”的外迁移民。下面就麻阳成为苗疆移民圣地和成因及其特点给予探讨。

二、麻阳移民“圣地”成因

1、麻阳地理区位：苗疆边缘“中心地”

麻阳是苗疆的码头，是移民迁出地和中转站。如《湖广水利论》史载：“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²⁾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本身就具有中转站的意味，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指出：“川北、川东与汉南相近，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日久，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宜于搬移。”³⁾这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诸多文献描述之一，麻阳移民就是属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一部分。通过对麻阳移民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以往在对“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过程的研究中，忽视了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的人口接受地的“苗疆”自身所具有的内部人口的迁徙能力。

笔者通过地名资料分析和田野考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圣地“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移民对苗疆边缘地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所谓“江西籍”移民，更多是苗疆内部原来的土著族群，通过明初“编户齐民”入籍，纳入中央政府的“王化”体系。其过程几乎是没有“迁徙”就“移民”苗疆，实现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的过程。

麻阳实现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过程”，逐渐成为苗疆边缘地“边界”上“王化”“化外之民”的“孵化地”。麻阳除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外，还有参与“江西填湖南，湖南填贵州”的移民运动。麻阳地接贵州，且有水道通达贵州，在“江西填湖南，湖南填贵州”的移民运动中，其显然具有地理上的优势。相比湖南其他县，在“江西填湖南，湖广填四川（贵州）”移

2) 魏源：《魏源集》（上册）《湖广水利论》，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3月，第1版，388页。

3) 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民运动中，苗疆的麻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交通优势。这完全符合热普夫人口迁移引力模型的原理。1946年，热普夫（Zipf）提出了“互动假说”（interactance hypothesis），奠定了人口迁移引力模型的雏型。按照这一假说：

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总量，与两地区的人口数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的 a 次幂成反比。这个模型的基本含义是：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因而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数量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人口数量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其基本的假设条件是，迁移者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而且各地区之间的迁移成本是相同的，每一个迁移者对机会的评价也一样。有关研究表明，这个模型在预测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数量上是相当成功的。⁴⁾

麻阳在明清人口都一直向外流动，人口流动外迁数量集中于清代康熙到乾嘉时期。这个时期的麻阳地方因有强大的军事家族和完善的寨堡体系，人口保有量较大。明末清初当地军屯制度名存实亡，为麻阳人外迁创造了条件。清初四川人口耗损严重，此时人口相对充裕的麻阳自然成为四川人口的迁出地了。因为迁出地和迁入地在人口数量上有密度差，造成了一个（四川）有迁徙接纳人口的需要，一个（麻阳）有迁出的动机。加之麻阳和川黔地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麻阳便成为“湖南填四川”极其重要的移民迁出地之一。学者指出：“人口迁移引力模型。这些模型都基于下列三项原则中的一种或几种：第一，一个地区的人口迁出数量由该地区人口数量多少和迁入地人口的多少决定；第二，地区间的距离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因素；第三，对于一个地区的迁出人口来说，有几个目的地在同时吸引或竞争他们。”⁵⁾

麻阳与川黔的距离有利于麻阳向两地迁徙。苗疆的“生苗地”和“土司地”因

4) 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与方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你那1月第1版，第75～76页。

5) 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与方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你那1月第1版，第78页。

为改土归流所经历的长时段过程，加之这些地区本身人口数量基数较少，没有外迁人口的动力。作为明代具有军屯地和州县地双重性质的麻阳，在交通区位优势下，其人口外迁便“一骑红尘”，在“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贵州）”移民运动中独领风骚了。

经济更发达的湖南中部和东部，离贵州和四川较远，这些地方“江西填湖南，湖南填贵州”时便由麻阳中转，麻阳的人口迁徙中转站地位让更多的移民以麻阳为迁出地和祖籍地。明代“麻城孝感乡”移民圣地的形成有“麻城过籍”之传说，麻阳在“江西填湖南，湖南填贵州”移民运动中，显然亦有“麻阳过境”之事实。

作为明清时期苗疆的“边缘地”的“中心地”麻阳，地域虽为“边缘地”，但有相对便利的交通，加之麻阳地方和国家力量相结合，通过各种形式的族群交流打破“边缘地”的边墙及其他有形和无形的“边界”实现人口流动并实现族群融合。

首先，明代不少麻阳人迁入贵州或经过麻阳中转进入贵州。明廷经略西南在贵州设省，贵州财政和军权归属湖广。麻阳地接贵州，是整个贵州军需储存和中转地之一。麻阳军事属于湖广管辖的镇远卫、偏桥卫、平溪卫、清浪卫等卫的屯垦地。明代麻阳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对麻阳与贵州的人口流动迁徙的影响。

其次，明清时期苗疆“苗叛”不休，麻阳成为管控苗疆之地。麻阳的军事人员向苗疆湘西苗疆四厅和黔东南新疆六厅，输出了大量军籍人员。更重要的是在交往过程中，诸多“蛮苗”成为“麻阳兵”的一员，许多“熟苗”内化（王化）成为国家体系的成员，“生苗地”人口繁殖也很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交流的背景下，麻阳成为一个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大舞台。这些因素增加了麻阳地方人口输出能力，增加了麻阳移民输出地的权重。

第三，明末清初四川人口耗损严重，清廷从湖南招徕人口，实行“湖南填四川”移民政策。此时麻阳人口保有量大，而麻阳地方屯戍的军籍人员在迁徙中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动员优势。保靖、永顺土司虽近川地，但这些土司地人口一直较少，清廷发布诏令主要也是针对湖南卫所地和州县地。土司地和生苗地在清初定有人口迁入四川，但相较湖南州县地和卫所地，土司地和生

苗地不是政府有组织的迁徙人口进入四川。因此在整个迁入四川的湖南迁出地中，辰州府下最西边麻阳成为最为重要的移民迁出地。麻阳是东方移民的漏斗底，是向西移民的喇叭口。

第四，改土归流对麻阳人口输出生苗地和土司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雍正和乾隆初，清廷在土司地和生苗地实现改土归流。管控苗疆地方的麻阳的军籍人员，尤其是麻阳军事体系下的“镇篆军”首当其冲进入土司地方和生苗腹地。这无形中使麻阳军籍人口在苗疆地方上的开发占有绝对的优先权地位，这是麻阳移民地名遍布生苗地和土司地的最主要原因。

2、生计土产：便捷“麻阳船”

人口流动的关键是交通工具，麻阳船作为谋生之道养活了很多麻阳人，也促使麻阳人在交通运输和商贸上发展。麻阳特殊的区位和军事地位，使得其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军事交通工具，于是麻阳“土产”麻阳船成为麻阳人转输人口和物资的重要交通依托。麻阳船除了服务于军事活动，也必然服务于商用和民用，这就为麻阳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动力。

同治《麻阳县志》卷五下《物产·风俗志》记载：“沿河居民惯习水性，操舟者多，巨津大河深资利济。”⁶⁾麻阳人有外出垦殖为生者，有渔猎者，有操舟者。麻阳人眼里，操舟驾船就是求食谋生的手段。麻阳船就是当地的“土产”之一，并且是极其重要的“土产”。该“土产”养活更多麻阳人口，地方政府也刻意保护“土产”。如乾隆《麻阳县志》上卷《土产》记载：

至于水居民，有非土中所产，又无异于土产者，则为麻阳船也。

沿河穷民，无以糊口，率多撑架小船，聊为资生之计。盖以滩高水浅，大船难行，惟小船可以驾力撑持。上至黔北，下遍楚南，所在皆是，即其所获以仰事抚育，数虽非土中所产，而一若为麻阳土产者然也。

6) [清]姜镜琇等修，刘士先、王振玉纂（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五下，《物产·风俗志》，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65》，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年7月版，第342页。

地方官每船给发照票以清河道，而察匪类，有上下陋规，一票费银数钱不等，官吏视为利藪，穷黎莫可奈何，前知县赵弘仪，禁革之后，其弊虽绝，但为今日久不无仍有暗索纸笔之资者。知县秦周彻底尽除，惟后之宰斯土这，同心利济，永绝陋规，更望勿以易起需索之端，遂将给票稽查之急务忽焉，漫不加意也。

然今之辰沅各县船户照式仿造者颇多，悉名为麻阳船，其中难保必无生事为匪，是又在稽查者核其实耳。⁷⁾

读乾隆《麻阳县志》上卷《土产》，麻阳船对于麻阳人的生计而言极其重要。“麻阳人遍天下”，“麻阳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麻阳水道考》载：“在昔轮船、火车未兴之时，麻阳早以船业著名，凡沅水流域之船，驶出湖南境者，无论人称自称，皆自为（谓）麻阳船。”⁸⁾可见沅江流域许多非麻阳籍人附会“麻阳船”变成“麻阳人”的情况不在少数。

首先，麻阳人认为麻阳的船就是地方土产，故严如煜《苗防备览·风俗》记载：“邑之西流向下济浦市、泸溪诸处，沿辰河西岸居民，习溪河滩浴，库篷轻舸，运载货物所在皆是。故辰沅诸大小船，通谓之‘麻阳船’。”⁹⁾

其次，麻阳船适合在辰河和沅江航行，其到达的区域“上至黔北，下遍楚南，所在皆是。”其主体航行是黔东南辰河，黔东南沅江上游直到洞庭，另外北上酉水到鄂西南和渝东南，远则过洞庭到汉口，西入巴蜀，到成都、重庆、乌江流域。这些流域和地域也成为麻阳人口流播的地域。

其三，麻阳船的运输业也成为各种利益争夺的焦点。为了保护麻阳船的商业利益，麻阳地方“每船给发照票以清河道，而察匪类”的行为较为合理，不仅有利于船户，且能够刺激麻阳船业的发展。

其四，麻阳船的成功致使各地附会仿造麻阳船极多，这也客观上提高了麻

7) [清]乾隆十二年赵弘仪纂修：《续麻阳县志》（上下卷），上卷，《土产》，现藏于麻阳县档案馆，第15~16页。

8) 麻阳苗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编：《麻阳县志》，卷十，《交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7月第1版，第323页。

9) [清]严如煜著，罗康隆、张振兴编著、杨庭硕审订：《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56页。

阳船的知名度，也无意间增加了“麻阳船”在沅江和长江中上游的数量。“麻阳船”的增加，自然是“麻阳人”的增加。麻阳船的增加也刺激了麻阳的商贸和运输业得到蓬勃发展。

麻阳地处苗疆边缘地的“边界”分界线，军事活动频繁，麻阳船也被国家所利用和倚重。如康熙《麻阳县志》卷五记载：“大师进剿黔省，满汉过往兵马五六万，凡军装炮位饷鞘粮米并紧急差使，络绎不绝，而凯旋各路提镇多由麻经过，所用夫船，俱系（麻阳）独立支持，并无分毫扳协于邻邑，夫军兴之际，有以僻济冲之例，麻邑向日尚不能扳有例之帮协。”¹⁰⁾除为国家运输军需物资外，传统麻阳运输业中也转输自己特定的商品。下水主要是山货、桐油、木材，上水则杂货与布匹，沈从文《过梢子铺长潭》指出：“这河里划船的麻阳人顶多，弄大船，装油（笔者按：桐油）几千篓，尤其非他们不可。”¹¹⁾《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记载“麻阳船”：麻阳船在湖南很有名气，分布较为普遍。因该船始于麻阳河内，故名。……常为沅江两岸的商行运输橘子、酒酿、桐油、药材、粮食等土特产。”¹²⁾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麻阳船就没有麻阳的移民，也不会形成如此多的麻阳寨和麻阳街移民聚落。

3、成本效益：“兵、寨、街”网络

麻阳人向外迁徙具有四向性、水陆结合的特点。移民的过程中，麻阳人还有聚族而居，在农村建寨或在城市建街等特点。“人、兵、寨、船、街”五位一体的移民迁徙的结合，使得麻阳移民在沅江各干支流的迁徙总“无往不胜”。

在中国各种移民圣地中，麻阳人外迁的成本最低但效益最大。麻阳人的低

10)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康熙]《麻阳县志》，卷五，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7页，第35页。

11) 沈从文著、卓雅选编摄影：《湘行书简》，《过梢子铺长潭》，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9月第1版，第59页；第63页。

12) 朱惠勇著：《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成本、高效益迁移是造成麻阳人在苗疆地区、滇黔和巴蜀人口众多的重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名著《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提出了“成本—效益”模型(cost—utility model)：该模型指出：

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迁移的效益是指迁移者在迁移以后因为拥有更好的机会而增加的收入。迁移的成本是指为了实现人口迁移而花费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费用，包括现金成本和非现金成本。现金成本指在迁移过程中支出的食物、住宿、交通等费用；非现金成本是指在迁移过程中和寻找新的就业岗位时损失的收入，以及心理成本如想念家乡、在新的环境中所面临的紧张感等。美国经济学家斯达科将舒尔茨的模型进一步量化。他指出，人口迁移的花费是人口迁移的投资成本，迁移后的所得是人口迁移的效益。人口迁移行为取决于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用于迁移的花费。换句话说，人口迁移实现与否，取决于人口迁移净收益的大小。¹³⁾

麻阳驻扎众多军籍人员的时候，这些军籍人员的迁徙往往以国家军资（如各地驿站塘铺、仓储以及军营）为保障，其个人迁徙的成本很低。麻阳移民在自发性迁徙时，往往依靠河流或自身家族拥有的码头、船坞以及麻阳的“土产”麻阳船，故而迁徙成本较低。此外，在西南水路迁徙往往较陆路用时较短，这也是影响麻阳自发性迁徙成本低而效率高的原因。

西南各地的河流众多，对于诸多移民是畏途，但对于善于操舟的“麻阳人”而言则是通途。麻阳人外迁成本低，故所得是人口迁移的效益高。加之绝大部分麻阳人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走到一地后便筑寨自保，且山寨往往职能分化成军事和生计两类，故麻阳人能创造湖南各县中绝无仅有的人口外迁奇迹。

黄大星《常德麻阳街话旧》一文指出：“麻阳船民在外乡聚居成街，不仅在常德有，现在贵州松桃、湘西凤凰、武汉汉口（笔者按：重庆秀山）都有

13) 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与方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你那1月第1版，第69页。

‘麻阳街’存在，这些麻阳街也全部是因麻阳船民的运输活动而形成。”¹⁴⁾麻阳移民在武陵各地建街，街道里除了有住宿、餐饮、修船、商贸等为麻阳籍人群服务外，更无形中有对麻阳人的关怀和保护，也节约了麻阳人在外迁徙、商贸的经济成本，进而提高了麻阳人外迁的效率，这更加提高并促进了麻阳人向外迁徙的能力。

一般而言，移民的迁徙路线往往和商贸路线存在一定的重合。通过对湘西存在的四十多个麻阳移民地名的分析，笔者发现这些地名之间相互联系紧密，俨然是一个麻阳人在湘西人口流动和商贸的网络体系。由于有沅江、酉水的畅通，寻找麻阳人在湘西的人口流动和商贸网络还是比较容易的。施坚雅中心地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城镇是人类社会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是区域的核心。城镇应建在位于广大乡村中心的地点，起周围乡村中心地的作用，中心地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向周围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传统中国城市主要由行政管理机构区、商业区和居民区三部分构成。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一般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商人活动中心，另一个是士绅和政府官员活动中心。在商业区，主要是一些店铺，其中一些店铺的营业室和作坊的工作间也兼作男雇员的食宿场所。”¹⁵⁾

在考察的和可以确指位置的麻阳寨和麻阳街中，麻阳街处在能通航的城市里，是麻阳人商贸和移民聚集地。以市场划分层级，汉口麻阳街属于最高市场，常德麻阳街属于州府级较高级市场，秀山、辰溪、松桃属于县域级高级市场，而各地麻阳寨则是大部分是中级市场，秀山麻阳寨属于初级市场。麻阳的移民聚落点就是一个个移民商贸活动点，也是移民彼此合作的县域活动空间。

14)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麻阳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10月第1版，第3页。

15) 原著G·W施坚雅，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评价（代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版，第2页，第8页。

三、麻阳：没有建构的、真实的苗疆移民“祖源地”

通过对麻阳人口流动的研究，作为“边缘地”苗疆的“中心地”麻阳，无论是从移民地名的存留，移民交通工具的专业化，流动人口的职业化，流动人口的具象化来看，都是明代“湖广填四川”的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无法比拟的。但为何“麻城”成为移民的历史记忆，而“麻阳”却没有形成这种历史的记忆呢？

湘西地名志资料中共有40个麻阳相关移民和文化地名，在以府、县为单位的移民地名中，麻阳独领风骚。另外笔者已经查到湘西地方志中出现过4个“麻阳”地名，这些“麻阳”专名地名是麻阳移民迁徙流动形成的。笔者多次考察，完全确认这些移民点准确无误是麻阳移民迁徙而形成。重庆的麻阳移民地名和分布点，显然比下表中所涉及的区域更宽。

图表2：重庆市（部分）麻阳移民地名表

| 地名 | 地名释名（缘由） | 备注 | 资料来源 |
|------------|---|-------|---|
| 秀山县支农街 | 原名麻阳街，1965年更名支农街。 | 湖南麻阳 | 《四川省秀山县地名录》1983年10月P10 |
| 秀山麻阳寨 | 村内住户的前人是从麻阳迁来。细沙大队驻地 | 湖南麻阳 | 同上P195 |
| 酉阳县木叶公社麻阳寨 | 此寨原有湖南麻阳人迁居于此，故名。（笔者在酉阳考察得知，酉阳木叶乡麻阳寨，主要是杨氏。其在酉阳细沙河汪家坝附近。属于梨耳村） | 湖南麻阳人 | 《四川省酉阳县地名录》1984年12月P94 |
| 酉阳县苍岭公社麻阳岭 | 从前岭上麻阳树多得名。（笔者认为应该还是与麻阳移民有关） | 麻阳树 | 同上P325 |
| 酉阳县麻阳寨 | 笔者在酉阳考察得知，酉阳兴隆镇土坪村有一个杨氏麻阳寨，分为上下麻阳寨。 | 麻阳寨 | 2015年4月10日到4月12日，黄叔生，张亮，周妮田野考察 |
| 合川市麻阳沟 | 麻阳沟所在原双河乡八村（1954年行政区划）通过百度地图在今合川市龙市镇双河村。1954年2月26日第51张人口登记表（政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制定的表）中记载合川县双河乡八村，乡村户住址为：麻阳沟。户主姓名：高双全，性别：男，年龄：四十一岁，民族：汉，备考：农。 | 麻阳沟 | 合川县公安局：普登记表。登记时间为1954年合川档案馆全宗号68目录号1案卷号328。 |

| | | | |
|---------|---|-----------|---|
| 合川老城杨柳街 | 合川老城滨临嘉陵江码头原来有八户左右的麻阳田氏家族在合川经商, 麻阳田氏已经从该地迁出。 合川田氏在麻阳寻根对接成功, 黄权生2015年2月2日亲自考察麻阳田氏祖籍地, 即合川田氏始迁出地麻阳锦和镇官村。 | 麻阳人 | 笔者2015年4月14到16日考察合川, 2015年2月2日考察合川田氏祖籍地麻阳锦和镇官村。 |
| 合川大小阕家沟 | 位于合川龙市镇。2016年1月4日下午黄权生, 张亮考察确认。 | 麻阳阕家沟 | 又见《阕氏书谱》并考察。 |
| 潼南县滕家沟 | 潼南县上河公社三岭大队滕家沟。 黄权生, 王雅雯2019年10月2日现场田野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40 |
| 潼南县滕家湾 | 潼南县柏果公社斩龙大队滕家湾。 黄权生, 王雅雯2019年10月2日现场田野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88 |
| 潼南县滕家沟 | 潼南县玉溪公社石门大队滕家沟: 滕姓聚居。 黄权生、王雅雯2019年10月2日现场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96 |
| 潼南县滕家沟 | 米心公社蟬鹤大队滕家沟。 黄权生、王雅雯2019年10月2日现场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102 |
| 潼南县滕家庙 | 潼南县永安公社朱家大队滕家庙: 朱家大队驻地。 黄权生、王雅雯2019年10月1日现场考察确认。 滕氏称该地位滕家祠堂, 滕家庙为他姓的称呼。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158 |
| 潼南县滕家湾 | 潼南县朱家公社葛藤大队滕家湾。 黄权生、王雅雯2019年10月1日现场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四川省潼南县地名录》1983年3月(内), P167 |
| 石柱滕家店 | 石柱栗新公社滕家店: 此处以前住户姓滕, 开过客店, 故名。黄权生, 王雅雯2019年10月4日现场考察确认。 | 麻阳滕姓仲四公后裔 | 《石柱县地名录》1986年10月P192 |
| | 以上15个地名, 除了酉阳县苍岭公社麻阳岭待考外, 其他均为麻阳移民后裔, 均田野考察确认。 | | |
| 总计 | 15 | | |

笔者推断麻阳人之所以相比其他县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无不与其擅长水运，“麻阳船”享誉全国有莫大的关系。笔者考察重庆秀山西阳的麻阳寨、合川杨柳街、秀山支农街，无不确认麻阳人在重庆的移民足迹，重庆以麻阳为地名或相关麻阳移民家族地名显然不止此15个地名。合川麻阳沟经田松先生确认，合川田氏曾经在今合川市龙市镇生息繁衍过，至今附近有其麻阳田氏迁入的后裔繁衍。在整个四川省（含重庆市），笔者在2002年到2005年数年时间内，以四川地名录为资料，对207个县市，一本一本的地名资料，一页页的查阅，其中以麻城或孝感乡命名的地名有9个（当时还没有排除这9个地名为麻阳地名的可能性），而2014年笔者只是对重庆一个直辖市地名资料结合田野考察，仅仅重庆就确考有15个麻阳移民地名。笔者通过百度地图以及网络搜索重庆大足县中敖镇有一麻阳沟，道客巴巴《关西徐氏宗谱源流》记载蓬溪县有麻阳沟地名，蓬安县新园乡有麻阳河（村）地名，这三个地名由于笔者没有考察，不能确认是否与麻阳人口流动迁徙造成，至少从统计学的角度，麻阳人在重庆和四川的移民地名显然超过了“麻城”地名。

麻城以明代形成的地名为主，而麻阳则以清代形成为主，都是人口流动后对祖籍认同而命名的移民乡籍地名。在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湖南的麻阳县是迁入四川的重要移民迁出地和中转站。《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载：“锦江水运，远在宋、元时已成为铜仁对外交通的水运航线。”¹⁶⁾其中沅江及其支流锦江和西水是迁出的重要水道，这几条水道沿线至今分布麻阳及其湖南移民地名（如辰州地名、麻阳地名）就是明证。

笔者考察麻阳、恩施、宣恩、来凤等地，发现这些地方保留有麻阳移民后裔的家谱、村庄，其中滕氏、张氏、黄氏等麻阳家族在湖北鄂西南都有分布。至今这些家族成员和麻阳祖籍地还保持着谱牒信息的交流，如宣恩黄氏麻阳后裔还组织家族团队到麻阳祭祖。

16) 贵州省铜仁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1986年7月，第1版，（内部资料），第5页。

图表3：鄂西南麻阳移民地名表

| 地名 | 地名释名（缘由） | 备注 | 资料来源 |
|---------------|---|--------------|---|
| 宣恩县高罗集乡麻阳寨集镇 | 因此寨人户是200年前由湖南麻阳迁来定居，故名。 | 湖南麻阳落业 | 《湖北省宣恩县地名志》1983年12月编P242 |
| 宣恩县高罗集乡老场上 | 该村原来逢场（集），后搬迁到麻阳寨，惯称老场上。 | 麻阳 | 《湖北省宣恩县地名志》1983年12月编P243 |
| 宣恩县李家河乡麻阳槽 | 因湖南麻阳人很早迁居到此山槽中居住，故名。 | 湖南麻阳人 | 《湖北省宣恩县地名志》1983年12月编P311 |
| 来凤县接龙桥乡麻阳寨 | 从此前此村人是湖南麻阳县迁来的，故名麻阳寨。 | 湖南麻阳 | 《来凤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志》1983年4月编P74 |
| 来凤县绿水乡麻阳寨 | 当地人由湖南麻阳人组成且多杨姓，该地人清代和民国到酉阳兴隆镇麻阳寨赶场，酉阳麻阳寨也到此地赶场。该表五个麻阳移民地名黄权生和朱全在2015年2月20-25日田野考察确认。 | 湖南麻阳 | 2015年4月11日笔者在兴隆镇田野考察再次确认。 |
| 咸丰原大田所龙坪官坝麻阳寨 | 麻阳寨：因为来自湖南苗疆苗族地区麻阳所建寨，故名麻阳寨。 | 谭志满等考察确认 | 谭志满、雷翔著：《适应与构建：田野中的官坝苗族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
| 宜昌伏波宫 | 因湖南辰沅人而建会馆，以往返川湘（鄂）驾驶麻阳船的麻阳人为主体的。 | 18年多次考察确认 | 又见刘光第《南旋记》，收《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 宜昌麻阳寺 | 宜昌县鸦鹊岭公社曾家岗大队麻阳寺：“540人。以庙取名。村处海营水库南侧。” | 19年1月8日考察确认 | 《湖北省宜昌县地名志》，1982年10月P412。 |
| 利川麻阳沟(巷) | 因为湖南麻阳刘，滕，陈等姓迁徙利川县东门外，其有一条大沟，该地域在清同治时期被称为麻阳沟，现代城市拓展，地域留有地名麻阳巷。 | 19年1月14日考察确认 | 又见同治四年《利川县志》，《县治图》“麻阳沟”地名，同见利川麻阳沟《刘氏族谱》，2013年版。 |
| 利川滕家院子 | 2019年10月5日下午黄权生，王雅雯田野考察确认。 | | 有滕氏族谱。 |
| 总计 | 10， 以上均是田野可考。 | | |

由于以麻阳为中心的湖南南部移民主要沿着河流迁徙，酉水、沅江、锦江河谷或水道就成为移民迁徙的最重要的路标和移民分布路线。而湖南南部移民有迁入四川固也有迁入鄂西南。麻阳籍移民迁徙到鄂西南的人口不少，其

中四个麻阳地名都分布在酉水流域，结合龙山、保靖麻阳移民迁徙的路线，我们可以肯定的得出麻阳移民是溯酉水迁徙到鄂西南南部宣恩、来凤、咸丰等地区，进而有进入恩施、建始、利川、宜昌等地。笔者对宣恩和来凤麻阳移民地名，进行了田野考察，其中宣恩和来凤主要是麻阳滕氏、麻阳黄氏迁入的，而保靖也是滕氏为主。但重庆合川则是田氏和阚氏等家族。笔者考察麻阳县，滕氏（包括黄氏）主要分布在下麻阳，即高村，今为新县城所在地；田氏在上麻阳，即锦和镇，即明清老县城所在，滕氏迁徙是下行入辰溪达沅陵，溯酉水入保靖、花垣、秀山、龙山、宣恩、来凤进而迁徙的；而上麻阳的田氏可能沿着中线或西线进入合川等四川重庆腹地的。下面再看看以麻阳为中心的湖南南部人口迁徙贵州的情况。

麻阳是进入黔东的门户，故经过麻阳直接或间接迁入贵州东北部的移民数量应该非常多，运用百度地图可以搜到大量的“麻阳”地名。由于贵州地名资料编撰极其简略，无法利用，笔者以几个能利用的地名志资料统计了有限的贵州“麻阳移民地名”。

图表4：贵州部分麻阳移民地名表

| 地名 | 地名释名（缘由） | 备注 | 资料来源 |
|--------------|---|------------|----------------------------|
| 施秉县半河乡半河村麻阳寨 | 村名。位于村民委员会驻地西北方，不通公路，小路距离约三公里。地处山冲，半坡建村，驻地斜坡，环坡条状聚落，坐西向东，木屋瓦顶。汉族聚居，十四户，九十二人，村中有初小一所。 | 麻阳 军事移民 | 《贵州省施秉县地名志》 1985年7月编P62 |
| 岑巩县大有乡麻园寨 | 村委会驻地。在大有西北7公里，长溪河边。过去是一片火麻地，故名麻园寨，俗名麻阳寨。 | 麻阳寨 | 《贵州省岑巩县地名志》 1987年12月P41 |
| 麻江县麻阳寨 | 麻阳寨为古地名。据《麻江县志》记载：“明初，乐户司辖麻阳，平寨等六寨。”建村迄今已600余年。住地原分两院，上称金家院，下称梁家院。因过去两院住户喜种园麻，上交官府酌抵烟粮，故得麻阳寨之名。273人，汉族，布依族杂居。后称“麻秧寨”系麻阳寨之讹。 | 麻阳寨 | 《贵州省麻江县地名志》 1986年1月P144 |

| | | | |
|-----------|--|-----|--------------------------------------|
| 麻江县麻阳寨 | 民国《麻江县志》卷二《疆域沿革》记载麻江分为六区, 领镇十四, 乡五十九, 其中一区领乡有十个: “曰聚户: 领麻阳寨在区东。曰山台: 领瓮河在区南。” (即麻阳寨在麻江聚户乡。) | 麻阳寨 | 民国《麻江县志》, 卷二, 《疆域沿革》, 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82页。 |
| 瓮安县九硐团麻阳寨 | 民国《瓮安县志》卷四《村市》记载九硐团: 麻阳寨, 官路沟, 狮子口。 | 麻阳寨 | 民国《瓮安县志》, 卷四, 《村市》第365页。 |
| 瓮安县南水团麻阳寨 | 民国《瓮安县志》卷四《村市》记载南水团: 麻阳寨, 上屋基, 清塘, 白沙井, 三湾河团。 | 麻阳寨 | 民国《瓮安县志》, 卷四, 《村市》第361页。 |
| 松桃县麻阳街 | 2015年4月13日, 秀山县文史专家刘济平老师告知笔者, 毗邻秀山的松桃县原来有一条街叫: 麻阳街。今改为杨芳路。以原武陵地名名人杨芳取代了麻阳街街名。 | 麻阳街 | 笔者2015年4月秀山田野考察获知。 |
| 总计 | 7 | | |

贵州查到6个麻阳地名, 笔者田野考察增补松桃县“麻阳街”地名一个, 共7个。事实上的麻阳移民地名数量应当更多, 不会低于50个。因为整个贵州数十个县, 笔者查阅中除了麻阳县、岑巩县、施秉县等少数县市有地名释名外, 其他绝大多数地名资料没有任何释名信息, 在全国地名资料中数贵州省的地名资料编撰贵州最为马虎, 地名信息最少。这严重影响笔者对贵州部分麻阳移民等地名的统计和分析。笔者对铜仁、江口等地的考察, 结合这些地名笔者发现, 黔东南的这些地区移民人口, 无论水陆主要都是沿着锦江迁入的。如民国《铜仁县志·邮传》记载: “水路由府治上小江, 六十五里, 至两河口, 与陆路同, 又六十五里至寨英场。水路至此。以上不通舟楫。水路有府治下湖南, 九十里至麻阳县, 与陆路同, 又一百八十里, 至辰溪县, 入沅水。”¹⁷⁾在整个苗疆和云贵的人口迁徙中, 走水路最为便捷, 不走水路, 沿着陆路走, 大部分也是沿着水路(道)而行。到了水路的尽头, 翻山, 再沿着水路(水道)而行。显然麻阳入铜仁到江口再翻山可入乌江, 或再沿河可到綦江、赤水河再入长江, 移民再可溯嘉陵江、岷江、沱江西迁。

17) 民国《铜仁府志》, 卷二, 《邮传》(据民国缩印本点校),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 第26页。

笔者考察铜仁等地得知，如麻阳黄氏、田氏、滕氏在铜仁有大量分布，至今麻阳迁出的后裔，最完整的《黄氏族谱》保留在铜仁市。铜仁的谢氏家族，是从辰溪经过麻阳迁入铜仁，现在麻阳和铜仁相交的锦江沿岸部分，其谢氏居民点有洋塘村、黄蜡关等地，经过铜仁，沿着锦江分散迁徙，谢氏在松桃、江口、沿河等地都有分布，部分迁入四川、重庆。更为奇特的是作为一个家族的谢氏，于是分布归属于侗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各种民族，这显然是地方为了争取少数民族政策，乱点鸳鸯谱，造成一个家族属于多个民族的乱象。

当然铜仁地区的移民主体是沿着沅江入辰河到达铜仁，进而继续北上或西迁的。如《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记载：“铜仁城区建筑物有类似汉口、常德封火统子的建筑特色。”¹⁸⁾这些建筑显然是沿着沅江被移民带到铜仁来的。而铜仁的物资也是经过麻阳中转到常德，入长江达汉口的。铜仁城夙素为黔东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据史料载：“早在宋元时起，沿锦江水运，就有湖南、江西和蜀商来铜贸易，以陶瓷及日用产品换取当地的桐油、花生、土布等农副土特产品。到明清时，已是舟楫往返，商贾云集，皇家每日征收税银常在百两以上，故有‘黔东护商栈’之称。在清末民初时，镇内已有大中商户400余家，小商号及摊贩买卖、遍布城区，购销两旺，生意兴隆。特别是铜仁的八大商号名扬一时，分别在汉口、常德设有钱庄及贸易机构，使铜仁商业贸易曾一度出现过兴旺时期。”¹⁹⁾由此可见铜仁经过锦江的贸易十分发达，这也促使了人口流动的产生。其中改土归流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如民国《铜仁府志·风俗》记载：“自改土以来，流寓于是邦者，多吴、楚、闽、蜀人，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²⁰⁾吴、楚、闽之人显然是沿着锦江入铜仁的，蜀人自乌江而南来，锦江与乌江线路相接，便是完整的一条人口迁徙路线。

18) 贵州省铜仁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1986年7月，第1版，（内部资料），第7页。

19) 贵州省铜仁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1986年7月，第1版，（内部资料），第8页。

20) 民国《铜仁府志》，卷二，《风俗》（据民国缩印本点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26页。

笔者目前所见可考的麻阳移民或麻阳文化地名80个以上。仅仅通过百度地图搜索贵州铜仁地区就超过46个麻阳地名，贵州一个省的麻阳移民地名目前可以查到有超过50个，整个贵州一省的麻阳移民地名可能在200以上，保守估计在100个左右。以一个麻阳地名为一个定居点，一个定居点为500人计算，贵州麻阳移民后裔可能在50000到100000之间。事实上贵州省和麻阳县极其紧密的偏桥卫、清溪卫、平溪卫、施秉卫等卫所，麻阳移民后裔，因为军垦原因，可能和铜仁一样，是麻阳移民迁入贵州最多的地区之一。事实上明清湖南麻阳移民迁入四川的更多，仅仅田氏在四川和贵州就有数万移民后裔，笔者通过谱牒估算，麻阳在明清六百年间外迁人口可能在10万人口以上，而移民后裔超过百万人口。仅仅目前确认为麻阳移民后裔的“麻阳寨”寨子和麻阳街在50个以上。以一个寨子的人口及其继续外迁的人口以1000人到2000人计算，这些人口就在5~10万人口。

麻阳地名的形成，是麻阳移民对新居地地名改造的一个过程，故张鸿奎先生认为：“地名变迁，移民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地名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移民本身的变迁状况。”²¹⁾麻阳地名在鄂西南、黔东南、渝东南甚至川中分布都是麻阳移民迁徙流动的结果。一个地名的命名和生成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有其经济 and 历史文化积淀基础的。陈正祥认为：“地名不仅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更能反映古代民族迁移或征战的痕迹，是文化遗产，有似化石，有文化层的指标作用。”²²⁾西南各地麻阳地名其实就是麻阳移民文化的符号，或者说麻阳移民影响着苗疆巴蜀、云贵地名的命名，彰显了麻阳移民人口强大的迁徙力和影响力。

21) 张鸿奎：《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史林》，1995年3期。

22)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台湾的地名—文化层分期》，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214页。

四、苗疆边缘地：明清麻阳移民时空

1、移民时间

迁入麻阳移民时段主要在元末和明初。迁入麻阳的人口以江西和辰州府为主体；明清时期麻阳地接生苗地，历史上族群间摩擦较多，“王化之地”起到管控苗疆“化外之地”的作用，故麻阳人彪悍尚武且喜欢从军，“麻阳兵”也深深影响到麻阳地方的人口迁徙活动。整个麻阳人口的外迁，从时空上，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湖南填贵州”屯戍移民阶段。明代在沅江到云贵水运交通沿线设卫所，这些卫所的军事屯垦人员基本属于“湖南（麻阳）填贵州”的一部分。麻阳作为控制大西南的一个交通要地和屯戍地，明代的人口迁徙以军事移民为主。麻阳屯戍的贵州卫所军籍人口，往返于贵州和麻阳屯垦地之间，其人口迁徙主要沿着辰河和沅江上游的清水江和濠水方向迁徙流动，彼此具有往返性和中转性质。故沅江上游和辰河上游地区留下众多麻阳地名，整个麻阳迁入贵州的人口中，迁入黔东南地区最多，一则麻阳与铜仁有辰河相通；二则是铜仁军需全靠麻阳供给；三则麻阳是协防和控制贵州“蛮苗”的军事要地，这几点因素造成麻阳军籍人口在铜仁地区的活动非常多。这种人口流动受到边疆军事活动的影响，主要属于军事移民为主，自发移民相对较少。

第二阶段：清初康熙“湖南填四川”奉诏插占移民阶段。随着明清易代，整个明代卫所制度崩溃，麻阳的卫所屯垦地，不得不在康熙时期“均里拨甲”，改革地方里甲制度。清初四川人口耗损严重，清廷对原麻阳地方卫所人员的控制力较弱，加之官府鼓励湖南人迁徙四川，于是地近四川的麻阳县有大量人口外迁，成为迁入四川移民人口最多的县之一。该阶段的麻阳人口外迁，成为麻阳人“湖广（南）填四川”数量最大的时期。由于湖南和湖北同属“湖广”，明代麻城移民在四川还是有相当的比例，在渐进性的移民过程中，诸多清代麻阳移民认同了“麻城”祖籍的籍贯，甚至出现明代“麻城”移民历史记

忆（认同）和清代“麻阳”移民的历史记忆（认同）混淆的情况。“麻城”和“麻阳”在当时彼此混淆，这事实上加深了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也造成了在移民寻根中“麻城”籍明代移民还相对容易找到“麻城”祖籍地地名或能找到谱牒的对应。清代的“麻城”籍却难以寻根，其源就在将清代湖南“麻阳”当成了“麻城”的移民记忆了。明代的“湖广填四川”是湖北为主，“麻城”是最重要的县级迁出地；清代“湖广填四川”以湖南为主，麻阳则是湖南最重要的县级移民迁出地。

第三阶段，雍正和乾隆初的“改土招民”迁入土司地和生苗地移民时期。雍正时期，清廷对苗疆的生苗地和土司地进行了改土归流，麻阳也实行“改军为民”，此时便一下释放了麻阳移民外迁的潜力。故雍正和乾隆初，苗疆内部的黔东、渝东南、湘西、鄂西南迁入了大量的麻阳移民，且多是军籍移民后代。这些移民分布在辰河、沅江、酉水等河道附近，或重要的原土司军事和交通要道所在地（参看“麻阳移民地名数量分布图”）。这些麻阳移民由于有严密的组织，有强大的麻阳船运输业为支撑，有麻阳兵的组织性和军事性，于是或在迁入地的农村建寨，或在城市建街，形成了麻阳县籍的商贸体系。麻阳县籍的移民和麻阳原籍一起，将整个沅江及其支流酉水、辰河等流域的商贸运输几乎垄断。麻阳移民固有的组织性、军事性、地域性，使得麻阳人的移民后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故改土归流后，武陵地区分布了大量的麻阳移民聚落村寨，村寨之间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寨与寨之间通过麻阳同籍组织或家族力量，以麻阳船、麻阳帮和分布在中心城市的麻阳街为联系纽带，使得整个麻阳移民后裔成为组织最为严密的县籍移民群体。

第四阶段，乾嘉“改民归屯”的戍守性移民。乾隆后期和嘉庆初期，随着武陵民族地区人口增加，社会矛盾滋生，出现了乾嘉“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清廷为了防苗，在麻阳以北重建边墙和寨堡，将原来许多民田改回屯田。麻阳地方初期虽有所抵制，但总体还是服从了国家，此时麻阳再次回到戍守“苗疆”“边界”的军事人员和军需汇聚转输的“中心地”地位。这种军事和政治局势无形中又加大了麻阳船交通运输地位的地缘权重，也加大了麻阳人再次从军的概率。麻阳人在“叛苗”区戍守，管控地方，也客观造成了麻阳人的外迁。

2、移民空间（迁徙路线）

笔者曾十多次深入武陵地区考察，踏查移民聚落和移民迁徙路线。下面以笔者考察的路线图，结合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来总结整个麻阳移民的迁徙路线。

恩施光绪《杨氏族谱》载有一个路引，其自镇远府和铜仁府附近迁徙到恩施的大致路线是：铜仁江口到麻阳，再到凤凰（麻阳街），北上到花垣县（有麻阳寨），尔后到保靖（该水路旁有麻阳寨），龙山里耶到龙山县城，再到来凤县（离城不远有麻阳寨），自来凤县到宣恩李家河（该地有麻阳寨），再到宣恩高罗（该地有麻阳寨），最后到达恩施²³⁾。比对路引，路引沿线多麻阳移民聚落点。

笔者通过十余次对麻阳移民迁徙路线的考察，发现麻阳移民基本沿着水系迁徙。下面以“麻阳移民聚落考察图”为参考，结合文献对整个麻阳移民外迁路线给予初步的梳理和总结。

整个麻阳移民迁徙路线显示出水陆结合的特点。下面以麻阳为移民迁出始发地（中心），主要以水系为参照，阐述麻阳移民或商贸的路线。

其一，辰河、沅江水道。从贵州江口辰河水陆东下到铜仁或麻阳，尔后自辰溪入沅江干流，东下过泸溪、沅陵到常德，经洞庭到岳州入长江，再东下可入汉口；沿长江荆江段西上可到荆州和宜昌，甚至经过川江的峡江段可入巴蜀。这是麻阳水路交通最为重要的水路交通线，是黔东到湘西再入湘北，再入江汉的通道。

其二，黔中澧水道。从贵州黔中瓮安，沿着澧水东下施秉，再到岑巩可到芷江，下洪江再到辰溪，西入麻阳，而后入黔东，东入沅江干流可入常德和汉口，这是黔东南澧水道；另有黔东南以麻江为起点，沿着清水江可在洪江与澧水汇合东下，此为黔东南到湘西再入湘北达汉口的沅江干流水道。

其三，酉水水道。在辰河与清水江东下到沅陵、沅西汇合点后，在酉水和

23) 杨洪林：《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05~106页。上面麻阳寨全为笔者考察所填入的。

沅江汇合处北上到保靖，自保靖西南下可到花垣，可达贵州松桃，而松桃有麻阳街；或西入到龙山里耶，再西南入秀山梅溪河，而秀山有麻阳街；在里耶沿着酉水北上可到来凤、龙山和宣恩。该水道是连接湘西、鄂西南、渝东南的重要水道。

以上三条水道，与陆路结合可到长江的乌江流域，也可以与珠江上游支流汇合南下广西和广东。

其四，黔东南道。以麻阳为起点，水路西入铜仁再到江口，西北上到印江或沿河入乌江，乌江北上到龚滩，下彭水到涪陵，到涪陵则西入重庆。在重庆水路一分为三，北上入嘉陵江合川可再分涪江、嘉陵江、渠江三江而深入川中腹地；可以从重庆西入泸州或宜宾，从泸州可经沱江入四川腹地，或从宜宾入岷江再到乐山入成都；东下可到万州下三峡。

其五，綦江水道。在黔东南路线中还有一条綦江路线，其路线大概是麻阳水路到江口，过湄潭再到遵义，遵义到桐梓，入綦江河经过綦江到江津，然后入长江，其中可以经过永川到合川，或者经过水路到重庆上嘉陵江水道入合川，或经过江津中转西入泸州和宜宾，而后入四川腹地（按：该路线参考清代合川闾氏路引）。

其六，渝东南道。由麻阳沿着尧里河入凤凰（有麻阳街），再北入松桃（有麻阳街），或沿河道下花垣，再到秀山，或直接从松桃到秀山；从秀山入川有两条可能路线，一条从秀山西入沿河，入乌江，与前面乌江水路汇合；或下在秀山沿着水路到酉阳龙潭古镇，龙潭起陆到酉阳，酉阳到乌江水路要道龚滩入乌江，再入长江干道而与前面线路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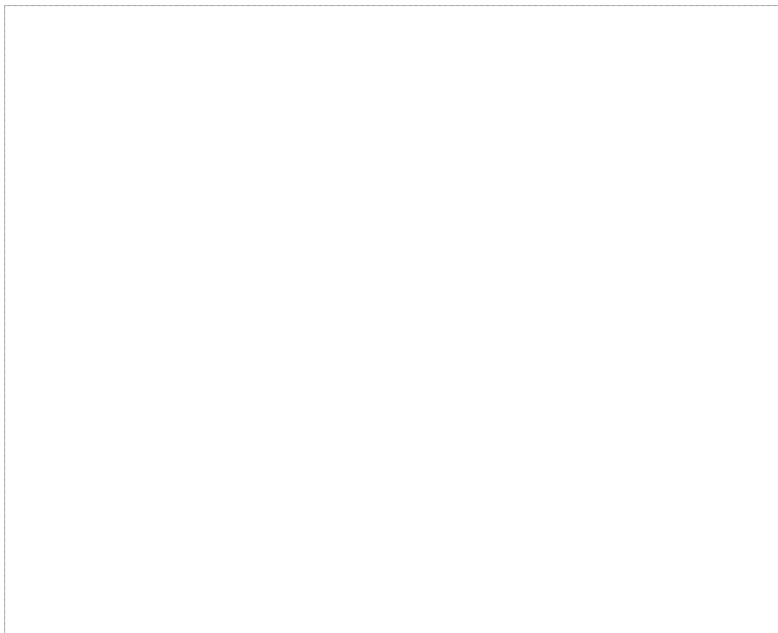
其七，湘西、鄂西南酉水道。沿着沅江东下到沅陵，北转入酉水到保靖，北上龙山来凤，可入宣恩、恩施，西转到利川入川江，东入巴蜀；或在龙山来凤，西入渝东南唐崖河，沿着唐崖河入龚滩，也可以西入黔江，到彭水郁山古镇，沿着郁江到彭水汇入乌江。在这宣恩、龙山、来凤、黔江、酉阳三省交汇之地，有酉水各支流，更有大量的麻阳移民迁入后形成的麻阳移民集镇，如宣恩高罗麻阳寨集镇，有宣恩李家河麻阳寨集镇，有来凤绿水麻阳寨集镇，有酉阳兴隆镇麻阳寨集镇，有酉阳木叶麻阳寨集镇等，这些集镇是麻阳移民在三省移民中转的通道。在明中后期，酉阳兴隆镇的杨氏票号可以在

这数省交界之地流通，这显然与麻阳移民后裔的聚落点成为一个完整的商贸和移民网络体系有关（参“麻阳移民聚落考察图”）。

其八，南下两广道。自麻阳可南入两广，沿着麻阳辰河东下辰溪，辰溪南下到沅江上游靖州，再入通道县，翻山可到广西怀远，便可进入珠江流域。

其九，东入资水道。麻阳还可东入资水，从麻阳到辰溪，南下到溆浦溆水，东翻山便可入资水，北上入洞庭，南下可到宝庆府等地。整个麻阳人口外迁参考图表6。

图表5、明清时期麻阳移民外迁示意图



（说明：该图由罗权博士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改绘）

上图中，沅江、辰河、酉水、清水江等本身就因麻阳船往返之故，其河流本身就是一个麻阳商贸和运输以及移民人口活动的路线，例如麻阳船自麻阳

可直达江汉平原的汉口，在汉口还建了麻阳街，而成都和重庆也多麻阳船活动的文献记载。

图表6、汉口江滩麻阳街图



(资料来源：来自百度图片。笔者结合在麻阳县接受文化馆黄军馆长以及麻阳一些老船工和老人的说法，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汉口麻阳街是因为麻阳商贸人口和从事运输的麻阳人活动而形成的地名。但今天绝大部分武汉人已经不知道汉口麻阳街的真正地名含义了。)

五、“边界”融合和地域文化

在麻阳，因为军事活动，“汉苗”有族群间的融合。如同治《麻阳县志》卷一《关隘说》记载：“嘉靖二十二年苗复猖獗，至（嘉靖）二十七年，总督张岳方力主川兵，始大破之。于是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有三，各哨以土兵、猺、蛮数百人，复招募打手数十人戍守。”²⁴⁾民国《铜仁府志》卷之九《武备·兵志》中记载明代铜仁府军士汉军约为五分之一，差不多五分之四的军士为苗兵和其他族裔士兵。²⁵⁾铜仁、麻阳等地军士大部分为苗兵和

24) [清]姜镜琬等修，刘士先、王振玉纂（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一《关隘》，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65》，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年7月版，第253页。

25) 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区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民国《铜仁府志》卷之九，《武备·兵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7~

其他族裔士兵，作为苗疆重地，士兵大多为“苗裔”。地方官兵基本上被“苗化”。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铜仁府》记载：“郡属各司夷汉杂居，有土人仡佬、苗人种类不同，习俗各尚，迨今渐被华风，浑然变易。”²⁶⁾故此时苗兵更多是地方概念，而非纯粹之族裔概念。面对地方有“苗叛”，“屯军苗化”还是引起统治者的担忧。如明末清初田英产《平苗议》指出：“就中汰去老弱以防悞事，临期退去苗兵以防异心。即以其粮饷另招艺精勇熟者。”²⁷⁾

“苗人”“汉化”实质是“苗兵”“汉化”的过程，也是以边墙为“边界”的“化外之民”转化为“编户齐民”的过程。麻阳地方兼具各种族群人口的精华力量，汉、土、苗、侗、瑶、仡佬、播等族群参与麻阳及周边军事，无论是语言和风俗上，皆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这使得麻阳人无论迁到贵州、巴蜀，还是迁入苗疆土司地和生苗地，其都能迅速融入当地，成为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佼佼者。关于麻阳人口融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麻阳军事体系的稳定性保证了人口融合的外部条件。明代在麻阳常设参将署，在麻阳地方和周边有常驻军队。麻阳的地方寨堡体系也十分完善，避免人口遭受巨大的浩劫。麻阳地方的军事仓储体系和屯垦的军屯等都为麻阳聚集军事人口创造了条件，麻阳兵“享誉天下”，当地兵员在对外迁徙中成为重要的外迁对象。行政区划上，麻阳从明代到乾隆元年属于辰州府管辖，乾隆二年属于沅州府管辖，但麻阳因贵州设省和管控苗疆的原因，其军事层级往往很高，战时跨数省的“剿苗”总督或巡抚等常设麻阳或麻阳附近，这就造成了麻阳特殊的军事层级地位。整个苗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犬牙相错”，“边界”之间民族交往频繁，这就容易聚集人口，提升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对于麻阳而言，麻阳政区虽是县级，但军事意义下的麻阳军事层级介于州府之上，甚至可以与省级平级；因军事让麻阳人在政治、经济、

159页。

26)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铜仁府·风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第393页。

27) 【清】姜镜琬等修，刘士先、王振玉纂（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十，田英产：《平苗议·上督师杨嗣昌阁部》，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65》，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年7月版，第504页。

文化上享有一定的特权，让麻阳拥有众多从事国家军事活动的人员，这无形中让更多的麻阳人口得以繁衍，让更多的人愿意成为有政治军事权力背景的“麻阳人”。

其二，麻阳地方家族对于麻阳地方的发展和文化的构建产生重要的影响。元末明初有麻阳田氏以寨堡“驱苗”恢复麻阳县治，明代迁入麻阳的各军屯军籍家族又巩固了麻阳的苗疆前哨军事地位。麻阳地方防苗军事体系中，各大家族积极参与建设寨堡、仓储、交通运输、戍守屯垦等方面的体系，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麻阳地方大族力量得以发展，出现了家国利益结合的良好局面。麻阳人在整个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使得麻阳兵和麻城船在整个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麻阳迁出性移民和麻阳商贸组织的严密性，加上国家力量的支持，使得麻阳移民在苗疆地区发展空间得到最大可能的拓展。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麻阳地区承接了苗疆其他地区无法承担的人口接纳、中转和迁出的功能。这是麻阳地处“边界”上的区位决定的，也是“边界”上族群交流频繁、人口迁徙频繁的原因决定的。

其三，麻阳移民迁徙的低成本因素。麻阳地方既有州县地的特征，也有卫所地屯戍的作用，故麻阳相比武陵地区其他地方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麻阳人群本身具有吃苦耐劳的特性，加之国家和地方官府扶植，因而其在控制土司地、生苗地过程中，军事人口聚集。加之转输物资的民间人口，造就了麻阳人相比周边土司地、生苗地具有局部人群优势的点状聚落。国家力量的驱动和自身的努力下，麻阳县有更多的能力、机会和条件迁入生苗地和土司地。在国家管控苗疆的大背景下，麻阳移民迁徙成本最低，但移民效益最大。

其三，麻阳船、麻阳帮和麻阳街的移民文化元素是三位一体的。麻阳船让麻阳移民在各地流动，在城市内部形成麻阳街；麻阳街服务麻阳船和来自麻阳的移民；麻阳帮维持基层空间中麻阳移民权益。在国家倡导下，麻阳人从军，拥有军功的麻阳人反哺麻阳地方，形成了一种加强县籍移民力量的良性循环，使得麻阳成为名符其实的“移民圣地”，并进一步体现在地方大族修建祠堂、谱牒和家族力量的整合和互助上。麻阳人从事商贸讲求信誉、买卖公平，麻阳佬、麻阳船、麻阳兵、麻阳街、麻阳帮等等都是值得信赖的和赞誉

的代号和符号，整个武陵地区商贸者都愿意成为“麻阳船”一部分，也愿意成为“麻阳佬”的一部分，麻阳街更是强化了认同空间的拓展。在武陵民族走廊的沅江、辰河、酉水上，麻阳人创造了诸多的奇迹和壮举，成为苗疆地区一种移民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湖南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也有“无箴不成湘”之说，而镇箴军只是大麻阳军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军事系统的产生与麻阳“边界”地理位置有关。

通过麻阳移民文化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窥探湖南在近现代历史取得辉煌的成就的原因。“麻阳精神”就是最好的注解之一，这种精神就是在以麻阳为族群交往的“边界”上实现了“跨越边界”的族群融合，催化了移民的外迁，可以说麻阳县就是整个湘西乃至整个“湖南”文化的缩影。从大湖南角度而言，湘西“蛮苗”族群体系的存在，对整个湖南地域文化特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南在接受儒家传统文化“尚文”基础上，也浸润了“蛮苗”族群的彪悍“尚武”文化传统，产生了“无湘不成军”和“无箴不成湘”之说。换言之，以麻阳为代表的湖南湘西“苗汉”之间的族群“边界”，是塑造湖南地域文化特征的催化剂。以麻阳为中心，“无湘不成军”和“无箴不成湘”也是湖南军籍人口外迁流动而“打”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质，是苗疆边缘地“边界”族群交往、融合和互相取长补短的结果。

六、“边缘地”的“中心地”麻阳移民身份重构

1、麻阳“移民圣地”的“真实性”的原因

首先，时间上，迁入麻阳的人口主要是以元末和明代为主，迁出人口以清初和改土归流后为主。清中后期到今天移民频繁返回麻阳寻根，迁出地和迁入地互动频繁。

其次，空间上，麻阳既是迁入地，也是迁出地，又是中转站和转运地。故麻阳能吸纳东部常德、辰州、沅州为主体的湖南、江西、浙江（江南）、广

东等迁入人口，输送这些人口到云贵（广西）和巴蜀。麻阳人口以锦江为横轴，沅江（酉水）为纵轴南北迁徙，“湖广填四川”以自南而北为主，而“湖南填贵州”以自东而西为主。

第三，经济效能来看，麻阳移民聚族而居，附带麻阳籍地域关系的人群为基础而定居。早期的移民以军事屯垦为主，康熙“湖南填四川”则纯粹是政府招徕移民，麻阳人口在迁入四川后多是插占土地；清雍正后期，在苗疆各地麻阳人和麻阳移民主要从事农垦、商贸、运输以及从军等行业。从麻阳移民聚落点来看，麻阳寨、麻阳街皆在交通要道上，麻阳移民形成交通、经济和安全保障网络，移民和原籍家族之间往往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和联系。

第四，从文献和移民历史记忆的传承来看，麻阳移民活动有着历史的相对真实性。表现在文献上“有谱”可查，祖籍、祖地、族人有地有迹可查，故迁出移民和祖籍麻阳的谱牒具有高度一致性；麻阳移民和原籍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尤其在麻阳兵和麻阳船等有形和无形的纽带下，麻阳移民后裔往往实现了蜀、渝、湘、黔（桂）、鄂跨省修谱传统，这让各地的移民信息得以反馈。麻阳船、麻阳商帮、麻阳军籍人的流动，让迁出后移民和麻阳信息的畅通和互动相比其他地区外迁人口容易得多和方便得多。麻阳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家族谱牒中“班派”（派行）的延展性和一致性较强，故迁入四川的麻阳移民能和麻阳的家族排行进行勘对，在实现有谱可查的情况下，许多还能班派可比。文革中，麻阳地方家谱保存的相对完整性，这也让迁出后的移民后裔有迹可循。更为重要的是，明清麻阳地名保留较为完整，地域地名相对固定是麻阳寻根的重要基础。麻阳地方村寨还部分保留了碑或祖先遗址或坟茔等，这些都为“寻根问祖”创造了条件。

麻阳地方重视谱牒传承源于地缘“内地”和“边缘”的交汇性。族群的身份和祖籍来源除了身份确认外，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斗争的需要。各个家族彼此斗争、协作，在麻阳家族群居，迁出后“县籍抱团”，故身处苗疆之地的麻阳人民更重视文献、重视家族信息。因而麻阳是多族群人口融合的大舞台，是多元一体国家民族融合的窗口。

麻阳船帮将云贵川的物质（粮、木、矿、山货）转出，将外面（布、油、工艺）输入内地，是麻阳人遍天下的经济基础。麻阳地方武装和地方帮十分

强大，这是麻阳人在周边乃至全国影响的武装保障。同时，这些条件为麻阳人流播创造了优势地位。麻阳人耕读传家，文武兼修，如满朝荐中进士，滕代远等从军等，为麻阳人和麻阳文化流播创造了文化心理。

麻阳作为地处川、黔、湘、渝、桂、鄂六省交通、军事、文化交汇之地，在苗疆边缘地“中心地”地位影响下，在麻阳辰河（锦江）的滋润下，在麻阳船的运载下，更在历代麻阳人辛勤劳动下，文化流播各地，形成了独特的麻阳移民输出文化。麻阳就是中国南方，尤其苗疆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移民圣地。

2、麻阳“移民圣地”的式微

麻阳移民不被学界所知，甚至被诸多移民后裔遗忘，还出现认“麻城”为祖籍地的情况，麻阳移民圣地其影响衰落的原因，可能如下：

首先，政治和军事原因。民国后，麻阳移民后裔陈渠珍控制湘西，他将其政治中心设在湘西中心的保靖借以控制整个湘西，此时的麻阳经济相对落后，且伴随交通区位转化，军事地位亦相对衰落。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力量的转移，麻阳地方失控，匪患滋生，地域内耗十分严重。内战和抗战期间，麻阳人口耗损严重，人口是“只出不进”的迁徙状态。麻阳人虽然尚武但面对国家政治的冲击，显然难以守住麻阳昔日的辉煌。

其次，明清麻阳作为政治、军事和交通的苗疆“中心地”，曾经创造了小农经济时代边缘地带的“辉煌”，故移民外迁频繁。但随着工业革命，麻阳人缔造的商业基础之一“麻阳船”难以抵挡工业化的冲击，分布在各地的麻阳街随着麻阳船地位的降低而一落千丈。麻阳商贸大厦赖以生存的麻阳船，迅速被机动轮船所击垮，麻阳商贸也随之沉寂。麻阳街因此基本消失，只留下了地名，甚至一些地方地名留存也被时代潮流冲刷殆尽。

3、麻阳移民身份的重构

通过前面的部分的论证，笔者已经烘托出麻阳是真正的“移民圣地”，但在麻阳外迁移民的历史记忆中，不承认自己祖籍来自苗疆“麻阳”，而是来自内地“江西”。麻阳只是移民迁出的一个中转站，我们知道其它“移民圣地”存在各种建构的情况，在这里反衬出本研究在麻阳“移民圣地”研究中的可靠性，确认了麻阳“移民圣地”是“真问题”。但在绝大多数麻阳移民后裔中，言必来自“江西”，鲜有直接说自己来自苗疆湘西麻阳的情况，事实上不直接承认祖籍来自“麻阳”，其实也是存在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和重塑问题。下面从“边缘地”的“中心地”的角度思考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

1) “江西填湖广”运动对“麻阳”移民历史记忆的影响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基本方法和资料》（地名考订与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中指出：“原始地名的转移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当地人口的迁移过程一致的，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这无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使我们得以通过考察地名转移的过程来复原移民迁移和定居过程。”“全面调查这些地名的分布情况和规律，能弥补文献的不足，有助于确定移民的具体来源和定居过程。”²⁸⁾笔者将鄂西南、湘西、渝东南的八十年代编的地名资料中的全部移民地名和贵州部分有地名释名的地名资料中的移民地名给予了统计。四川有51个江西省籍移民地名，占四川省省籍移民地名总数的4.79%。²⁹⁾湘西共有江西105个江西籍移民地名。仅仅湘西的江西省籍移民地名就是整个四川省（含今重庆）的江西省籍移民地名的两倍。重庆江南各县共有“江西移民地名”18个³⁰⁾，占整个四川江西移民地名的35.29%，由于属于重庆江南各县不过十余县，相比笔者统计的整

28) 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06~107页。

29) 蓝勇、黄权生著：《“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5页。

30) 重庆江南指的是地域在重庆长江以南，包含地跨长江（川江）的县市。

个207个四川县市这个比例是极高的。贵州一共可查阅的数县地名志可见“江西移民地名”8个，由于贵州省资料不全，只是几个县的统计结果，和四川省比较起来，贵州省的江西省籍移民地名比四川也会高一些。鄂西南共有“江西籍移民地名”30个。

《麻阳姓氏》记载迁入麻阳的省籍家族最多的是来自江西的，江西迁入的家族出现了101次，占170宗支中比例为59.41%。³¹⁾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讨论洪武年间湘中迁入的424个氏族中有345族迁自江西占总数81.3%。³²⁾而在湘西洪武年间的161个氏族中，有81个来自江西，占50.3%。³³⁾

在明代，确实有大量的江西移民迁入湘西，也有迁入麻阳的，但由于麻阳在明初对原土著实行“招抚”并“编户齐民”，故这些家谱记载的祖籍江西家族并不一定全是“江西人”，更多的是一种对内地江西的祖籍地的文化认同。笔者考察秀山、酉阳等地江西村、江西屯，这些移民恰恰是从湖南甚至麻阳迁入的，这些地名之所以叫“江西”，都只是家族传说祖籍来自“江西”。故在湖南麻阳移民迁入湘西、渝东南、贵州等地后，大部分谱牒都直接记载迁出地，如湖南麻阳，但移民口传大都自称祖先来自“江西”，而真正的迁出地则没有在移民脑海里形成历史记忆。

魏源《湖广水利论》载：“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³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整个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之间的一场移民运动，魏源所说当明之际，事实上，明初到清初这个移民运动都存在，从移民空间的转移而言，明代确实存在“江西填湖广”然后有

31)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麻阳姓氏》，1994年6月第1次印刷（内部资料）。

32) 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02页。

33) 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2页。

34) 转自魏源：《魏源集》（上册）《湖广水利论》，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3月，第1版，第388~389页。

“湖广填四川”的空间移民差，湖南尤其湘西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转站。但清代的“湖南填四川”或“湖南填贵州”中，这种“江西填湖广”移民历史记忆还深深烙在移民后裔的历史记忆中，这就大大混淆了清代直接从湘西等地迁到四川和云贵的移民籍贯问题。而作为移民重要的迁出地和中转站“麻阳”受到“江西填湖广”移民历史记忆的冲击影响最大。

2) 渐进性移民造成历史记忆的淡化

湖南湘西等地迁入四川或者贵州是自发性移民，是一个“填鸭式”的移民过程，这些移民总量到清中后期可能超过原有明代留下来的“土著”，但其迁入的过程较长，贵州、四川等地原有明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历史记忆会逐渐吞噬和冲淡这些移民的“祖籍地”记忆，而清代以湖南麻阳为代表的移民的历史记忆到了清末和今天则所剩无几了。以上都是从客观条件影响麻阳移民文化认同和移民地域身份的认同，下面就以主观层面来看，麻阳人和麻阳移民后裔是如何选择“祖籍地”的。

3) “向心的边缘”：麻阳移民身份的“重构”

笔者认为作为从苗疆边缘地麻阳迁出的移民，族群复杂，很多是原来“土苗”族群，为了掩盖自己出身的来源，有刻意淡化来自湘西麻阳的可能。如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后记）》指出：“元明以来西南各省土司的族谱，说他们的祖先出于中原，以从军征伐至西南某地而成为当地的土司的很多，这种记载虽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可以说大多数是靠不住的。”³⁵⁾

又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指出：“（首先），‘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而认为族群是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其次，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因此，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

35)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后记）》，收录于：谭其骧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10页。

边界的变迁。第三，族群边缘环绕中的人群，以‘共同的资源记忆’来凝聚。因此，个人或人群都经常籍著改变原有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如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第四，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族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最后，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怀，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间、阶级间、地域群体间的关系。”³⁶⁾在麻阳这个苗疆“边缘地”的“中心地”通过民族融合而将“外化之民”变成“王化之民”的外迁移民群体，当其外迁后，更愿意说其祖籍来自“江西”，而不愿意提及自己来自苗疆。

因为“‘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与其它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³⁷⁾来自苗疆的移民为了表明自己身份不是来自“异族”，自然愿意以大家广泛接受的“江西填湖广”的祖籍地“江西”或者中原那个地方为祖籍地。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³⁸⁾谭先生之分析非常有道理，整个中华民族以长城为界，游牧和农耕文明进行着文化的互动。而在南方，“蛮族”的山地文明和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明也形成了文化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湖南湘西（尤其麻阳）则尤为明显，深深影响着整个湖南人的地域文化。谭老同时强调“然则蛮汉之不同，不过因其开化有先后之别耳，在种族本质上固无优劣之可言也。”³⁹⁾

36)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2页。

3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24页。

38)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收录于：谭其骧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10页。

曹树基指出：“湘西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土著数目之多，为湖南其他各区瞠乎莫及。湘西氏族中土客蛮汉混淆之复杂，也为他区所不见。这是分析湘西人口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⁴⁰⁾如谭老指出：“靖州仁亦为蛮疆，亦在熙宁中纳土，然以远在省境之最西南，且纳土后又中经变乱，故除少数例外，盖自南宋时其地始为之族人所至。”⁴¹⁾麻阳作为苗族前哨大约也如此，这恰恰是原苗瑶族群经过民族融合实现了国家认同，实现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的结果，是一个“向心的边缘”。

作为边缘“中心地”的麻阳是巴蜀和苗疆移民的“祖源地”之一，但因为地处苗疆，移民不愿意提及来自这个“边缘地”。但在移民活动中移民后裔以麻阳为专名建麻阳寨或麻阳街，似乎又在强化来自麻阳这块“边缘地”，但这只是在移民自我认同中，移民先祖是从“江西”迁到麻阳，再从麻阳转徙的结果。应该说麻阳移民文化上以“江西移民后裔”为凝聚力，但在商贸和军事等实际活动中则以“麻阳地域”为凝聚力。故麻阳移民后裔在经济凝聚和文化凝聚上出现了割裂。

在这种认同过程中“许多地方原流行的‘弟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或被根本遗忘，或者人们记忆中的这些始祖‘弟兄’随一个由南京、江西、湖广或河南来的‘父亲’迁于此地。”⁴²⁾麻阳为明清“蛮汉”交接之地，是“武陵前哨”之地，也是“武陵码头”之地，故该县的“华夷观”或“蛮汉观”极其强烈。

在元明清时期，从外迁入苗疆屯垦、商贸、官宦等移民，自然标榜自身的非“蛮族”身份，其在土地分配、水陆交通、城镇经济、文化话语等方面均占有绝对的主动权。此时迁入苗疆的人口以男丁为主，自然会与“苗蛮”发生婚姻关系，而不少与内地移民接触的“苗蛮”，即我们熟知的熟苗，也标榜祖先来自内地，苗疆湘西则以祖籍“江西”为主。

39)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收录于：谭其骧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410页。

40) 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第114~129页。

41)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收录于：谭其骧著：《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45页。

42) 王明珂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7月，第1版，第217~218页。

《麻阳县志·人口》记载黄姓“苗人通婚”，田姓“其后裔与土家族、苗族杂居通婚。”龚姓“与苗人通婚”，周姓“与苗人通婚”，谭姓“与苗人通婚”，莫姓“与苗人通婚”⁴³⁾。汉苗通婚非常普遍，历史上客观存在过，麻阳诸多明清移民后裔，一半流淌着其他兄弟民族的血液，但经过一两百年的民族融合，大部分麻阳人已经适应了当“汉族”的生活。但在这里笔者认为，但在日常生活中麻阳人又无处不在“侵染”着苗风，作为苗疆边缘之地，苗汉之间已经难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明珂认为：“站在边缘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⁴⁴⁾这句话放在麻阳县的“苗汉”民族关系、在民族认同上最适合不过了。

《麻阳县志》卷首《麻阳县城郭说》记载：“惟地邻蛮苗，屡苦侵扰，自嘉庆就城西三峰扼险建碉，依山筑堡以来，藩篱因之益固。”⁴⁵⁾这里麻阳“扼险建碉，依山筑堡”发展到极致就是我们熟知的苗疆“边墙”和寨堡体系。但“边墙”是无法阻止苗汉之间的交往的进程的。如《“边墙”图说》指出：“‘边墙’，乃先明兴筑，借以捍蔽苗类、保障边圉也。夫尔时，以七千八百余名之兵不足恃，徒恃此土筑一墙，欲依之以为固，舍人和而专言地利，亦何计之拙也。卒之诸苗强横，不旋踵而毁为平地，其咎岂尽在苗哉？”⁴⁶⁾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麻阳已经没有自称是“苗”的族群。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汉化，一部分没有汉化的皆称自己祖先为“江西”或内地某地的祖先“征蛮”而留居。从形式上看，麻阳的苗族几乎是“消失”了。赵世瑜指出：“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

43) 麻阳苗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编：《麻阳县志》，卷三，《人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7月第1版，第135~148页。

44)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88~89页。

45) [清]姜镜琬等修，刘士先、王振玉纂（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首，《麻阳县城郭说》，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65》，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年7月版，第227页。

46) 段汝霖撰，谢华著，伍新福校点：《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4页。

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人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⁴⁷⁾

在以麻阳为中心的苗疆边缘地迁出的人口，出于在迁入地生活的需要，一般言祖籍地则为“江西”，这都是体现自己正统身份的需要，从这种角度，其不承认“祖籍地”来自麻阳这个苗疆“边缘地”也是一种建构。让自己原来带有的“蛮苗”族群成分被掩盖和消失。

笔者认为这种“消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汉族起到核心凝聚力的作用。“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⁴⁸⁾

赵世瑜指出：“区域社会史的途径是推重问题的，允许跨时段的，其最终目的—定是跨区域的，甚至是整合性的。……边缘与中心地区、群体等等不断发生置换。”⁴⁹⁾以麻阳为苗疆边缘地的外迁移民，通过民族融合，在麻阳地域上实现了地域文化认同的整合，在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中，以来自内地移民中心地“江西”移民自居，实现了移民来源身份的置换和重新建构。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指出：

华夏认同的形成不只依赖共同的“边缘”，更依赖共同的“起源”。这“起源”

47)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64页。该文也收录于《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1版，第96~124页。

4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收录于《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8月第1半，第62页，第52页。

49) 赵世瑜：《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收录于《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1版，第51页。

便是可以让所有华夏产生同胞手足之情的“根基历史”。⁵⁰⁾

在明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处于湖北和湖南的移民都认为起源于“江西”，则为“江西填湖广”，江西人成为整个湖广（湖南、湖北）两地祖源地。巴蜀地区的“湖广填四川”，则主要是“湖广”，湖广以“麻城孝感乡”为移民祖源地，而事实上“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地来自多个府县，其中麻阳县、辰州府、宜昌等地则是和麻城一样是重要的移民迁出地。

但整个明清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都是一个移民整体。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广填云贵”，麻阳就是整个“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贵州）”的极其重要的中转站。麻阳地方民风确实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风俗·麻阳》记载：

麻阳家居朴素，需费俭约，民虽困极，不丐不盗不鬻，男女士知向学，文风渐盛。⁵¹⁾

整个麻阳地方的核心区域在明代，由于地方被屯卫化和州县化后，许多屯卫和州县民的子弟都读书。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科甲进士·麻阳》记载麻阳有明復、杨亨、陆忠、张海、孙滨、孙綬、龙璿、张泰、郑子良九人中了科甲进士，而溆浦县则只有贺瑞英一人⁵²⁾。可见麻阳受到中原儒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也为麻阳地方在“江西填湖广”这场移民运动中，能将自己的“祖源地”和移民历史文化建构起来。这从文化上，让麻阳人有足够的“文化人”让麻阳当地人成为“开辟辰河”是江西来的开疆拓土的“英雄”移民。加之麻阳人口在明清时期确实成为国家防“苗蛮”的国家半军事和地方社会力量，故他们也有理由将自己纳入华夏“江西”的族群。

50) 王明珂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7月，第1版，第43页。

51)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风俗·麻阳》，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452页。

52)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七，《风俗·麻阳》，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475页。

任何历史事件和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许倬云《试论网络》讨论的网络体系包含的“社会体系、思想体系、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对于移民和人口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另外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有：“他者”、“我者”的提法⁵³⁾。鲁西奇总结许倬云网络体系观点，其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探讨中华帝国的体系结构及其变化，认为中华帝国体系之成长，有两个层面：一是向外扩大，即帝国体系在空间上的扩展；二是向内充实，即帝国体系内部的充实，并提出了“内地边缘”和“边缘”的“核心”的观点。⁵⁴⁾该理论和观点对于解决麻阳移民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借用许倬云和鲁西奇的视野和观点，麻阳地处五省交界的交通网络体系中，在政治和社会等体系影响下，造就了麻阳“移民圣地”的生成，也让麻阳族群间“他者”和“我者”关系发生了变化，“他者”都逐渐向“我者”实现了转化，并最终实现了族群融合。

但明清时期麻阳移民“圣地”的形成，还是麻阳特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是“时势造英雄”。明代将麻阳地方卫所化，附近卫所在麻阳屯田，麻阳地方军屯人口大大超过“民”数。这些屯卫人口既有外来迁入的人口；有由当地土著身份转化，由原汉化程度较高的“蛮苗”土著转换成“编户齐民”的屯卫人口的情况；可能还有原“生苗地”到卫所需求发展的苗疆人口。

麻阳地方人口屯卫化，屯卫的户口和田赋都不在政府统计范围内。同时麻阳地方人口分为屯卫人口，这是绝大多数的人口，然后是散处地方的“蛮苗”人口，然后才是国家统计的户籍所在的“民”数。明代麻阳科甲数比例较高，尤其大大超过人口和田赋较高的溆浦县，这可能是麻阳屯（卫）籍的子弟在科甲方面受到照顾所致。而中央政府服务的麻阳地方在整个辰州乃至沅水各县，其都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也为后来麻阳人口外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麻阳地方利益往往和国家利益是紧密结合的。国家对于麻阳人的认识

53)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第1版，第95页。

54)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是好斗而不畏苗，地方多苗寇，但麻阳人却“不丐不盗”，麻阳地虽处于“边缘”，但却是国家经略苗疆，遥控云贵的“中心地”，整个屯卫和民人是“向心”的，地方族群心理认同国家，在行动是维护中央王朝的。麻阳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来自“华夏”江浙、中原、江西、江汉（其中以认祖籍“江西”为主）。即使一些“蛮苗”由于地处“向心的边缘”的麻阳，地方族群身份也“重构”，成为祖籍“江西”的族群。

总之，明清的麻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麻阳移民迁徙模式，在农村建立麻阳寨，在城市则建麻阳街。由于麻阳人长期参与国家军需物资的转输，形成了麻阳地方“土产”：麻阳船，成为麻阳移民迁徙和从事商贸极其重要的工具，成为麻阳移民符号，彰显了麻阳人的吃苦耐劳、乐观、讲求信誉的移民秉性。麻阳移民祖籍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军籍，积极参与国家的军事和地方戍守屯垦活动，“麻阳兵”也成为麻阳人国家认同的一个标志。麻阳移民符号中的麻阳佬、麻阳帮、麻阳寨、麻阳街、麻阳船等地域文化元素既是麻阳移民流播的结果，反过来也促进和强化了麻阳移民的外迁。麻阳借助其“寨、街、兵、帮、船”的移民和商贸网络体系，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独一无二的苗疆“移民圣地”。

※ 이 논문은 2020년 2월 10일에 투고 완료되어
2020년 2월 17일부터 3월 4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20년 3월 5일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 결정된 논문임.

Abstract

The Fusion Across the “Frontiers”: A Study of Population Flow of May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Huang, Quansheng

The population moving out patterns of May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At first, the immigrants across the frontier did in fact happened, and has been lasting until now, the immigrants remained long periods and were voluntary, gradual and cohesive. Secondly, the population moving out from Mayang had some characters: some clear trajectories, the Mayang Streets, the Mayang soldiers as immigrants, the Mayang boats as traffic tools, the groups named Mayang Groups and Mayang Guildhalls as some kinds of ensure supplies. With the relocation of Mayang immigrant population, Mayang immigrants as "outsider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s, and across ethnic groups formed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identity that was “Mayangers are of one family.” They established Mayang Village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cities and built Mayang Street. With the symbols mentioned above, Mayang formed an immigration and commerce network system, also to become a Miaos Frontier’s “Immigration Sarced Lan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keywords :

Miaos Frontier, Mayang, Population Flow, Immigration Sarced Land